

郑学檬教授访谈录

● 郑学檬 ■ 徐东升

郑学檬，教授，博士生导师。1937年9月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196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1984年任厦大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1985年9月任厦门大学教务长，翌年7月任副校长（1990年10月起为常务副校长）至1998年7月离任。曾于1992年至1998年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等学术领导职务。

在《厦门大学学报》、《学术月刊》、《历史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主要学术著作有：《简明中国经济通史》（合著，198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作者之一，1986，厦门大学出版社）、《福建经济发展简史》（主编，1988，厦门大学出版社）、《五代十国史研究》（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赋役制度史》（主编及作者之一，1994，厦门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1996，岳麓书社）等。以上学术论著，在唐五代的商品经济、赋税改革、区域经济、历史人物等方面多有发微。特别是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探索卓有建树。《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的冶金业主要是为农业和军事服务，制造农具和兵器，促进了工具制造业的发展，但因为有机床，使机械制造业缺少母机的基础作用，未能使木构件机械进步到金属构件机械，难以使纺织、农业、制造业的生产力取得划时代发展，大而言之，中国古代机械工业本身没有更高的动力需求（如蒸气动力），因而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变得漫长。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兰克利博士读了该书以后，认为这一论述极为独到，对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原因提出了新的合理的解释。

■郑先生，您在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有目共睹，这些成就的取得自然离不开独到的治学方法，请您就治学经历、研究心得以及当前的学风问题谈谈自己看法。首先，不妨从您的治学经历谈起。

●60年代初是个物极必反的时代，经过“反右”、“大跃进”的折腾后，学术界、高校元气大伤，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视学术的呼声高涨。1960年我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隋唐史教学工作，随韩国磐先生做助教。自1964年开始，系里又安排我接替傅衣凌先生教授“中国古代经济史”。现在看来，这是我一生的一次机遇，从此在老一辈史学家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唐史、经济史研究。但直至文革结束，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在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主要是读一些基本史书，抄录一些资料而已，并在韩国磐先生指导下，写了一些习作，为研究作了初步准备。当然，那时我们这一代人为了进行思想改

造，曾非常认真地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从中受益非浅，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开始，除继续教授“隋唐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外，开始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发表一些有关隋唐史、经济史方面的文章。

■郑先生，您从60年参加工作到76年文革结束，长达16年，而在您现有的众多著述中，只有5篇文章是在那时写作的，可见文革十年对您学术研究影响之大。可以说，文革的结束，是您学术历程真正的开始，我想这其中除了学术环境得到改善外，还当有别的原因，您为何能较快进入角色并能取得成功的呢？请您就此谈谈。

●文革结束，十年大好时光逝去，不过当时在资料整理和理论方面已有相当基础，关键问题是如何找

到突破点。唐代历史研究，老一辈学者大多上挂魏晋南北朝，着重研究唐前期、中期，成果很多，很难超越。而晚唐五代史的研究相对薄弱，一般地说唐史学者少有联两宋，所以我选择了晚唐五代史作为突破点。当时恰好卞孝萱教授约我参加写作《五代史话》，通过写作发现不少问题，如将五代不加分析视为“乱世”，似欠公允，与其视为“乱世”，不如将其作为承前启后的时代去研究。历史是一个由统一到分裂、由分裂到统一的复杂过程，不重视转型期历史的研究，就很难对统一时期的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历史上“乱世”文士多喜读《春秋》、《易经》，意在寻找新的出路，所以，“乱世”、“分裂”之时，往往是问题最多，最值得研究的时代。大体上，我对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唐五代史，撰写了一批论文，并在此基础上，1991年写成《五代十国史研究》一书，现在还在思考，也许会写一部《晚唐史》。

■据我所知，除晚唐五代史外，经济史也是您的研究重点，并且不断变换角度，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您是否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由于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工作，对经济史的发展脉络略有了解。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既有辉煌、繁荣的一面，又有迟滞、落后的一面，原因复杂，所以单纯从某一个角度、用某一种方法去研究经济史，实难客观地反映中国古代经济史发展的全貌。针对经济史学界长期偏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经济史的现状，我逐渐意识到还必须从生产力史的角度去研究。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而言，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言，前者是外因，后者才是内因。1989年，有机会到欧洲作学术访问，开始较多地接触西方经济史原著，并和牛津大学、莱顿大学的经济史学者进行较深入的交流，发现了他们研究的特长，很受启发。反观国内学术研究中的局限性（如常常用政治观点看待经济问题，缺乏研究经济史所需的理论和方法，知识陈旧等等），深感不足。欧洲近代、现代经济学者的研究成就是很高的，他们的理论、资料、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学者施坚雅就很重视欧洲学者的研究方法。很遗憾，我们这一代学者，许多人对欧洲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方法知之甚少。

90年代开始，我的研究方法发生转变，开始把技术史和区域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个突破口是经济重心南移问题。自张家驹先生《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出版（1957年）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讨论渐次展开，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或简或详的意见。因为我已做过江南三个地区（太湖地区、长江中游、福建）的初步研究，

比较容易参与这场讨论。1988年，我和陈衍德同志合作写成了反映我们观点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这篇长文，对南移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比如开发地区与经济重心地区的区别；南移的标准；南移完成时间；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中心分离以及对南方地主集团的依仗等。总之，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描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诸方面表现。

在这个基础上，我申请到1990—1993年国家教委第二批博士点基金课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综合研究》。这个课题如何做？由于不愿重复描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表现和已提出的问题，我决心从技术进步入手，深入研究南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

基于这种认识，我写成唐、宋航运业，唐、宋农田水利与农业以及冶金与制造业等三个领域五篇论文以及其他有关文章，力图从另一角度阐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寻找导致中国社会停滞的生产力史方面的原因，而不仅仅是追究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

■郑先生，您的文章在理论、观点、方法等方面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您在《唐代德两朝党争和两税法》一文中认为，两税法之所以由杨炎奏请，并且在德宗即位后颁行，不仅仅是税制改革和财政形势的需要，还和当时的党争有一定联系，也就是说，党争的需要促使杨炎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奏请实行两税法。这是您的独创之见，类似的观点您还有很多，您能不能就此谈点看法？

●我的确时常在寻找对历史的新的解释，不满足于流行的观点，例如：

①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究。我在1980年发表的《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商帮的形成、商业资本的运动等问题，主张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商业资本问题。在1982年发表的《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场概念。这对中国市场史的认识有帮助，因为地方小市场是形成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的基础。

②关于中国南北农业发展道路的差异。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指出中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上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是也。因为北方是古代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而南方则没有那么多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所以江南的农业发展道路与北方迥异，较早出现农业商品化倾向。在《关于唐五代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再认识》一文中提出，唐后期江南户口数量锐减，不完全是户口隐漏、逃亡问

题，也是当时农业人口向其他行业转移的结果，是江南农业经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重要表现。

③生产力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提出，中国古代机械工业不发达，主要生产工具没有从木构件转化为金属件，不能引起动力革命，工业革命也就无从谈起。有人认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工业革命没能在中国首先发生的原因，但欧洲也有封建制度，却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可见，能否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应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模式。

④历史人物评价。在《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考察历史上民族关系中诸如儿皇帝、侄皇帝、孙皇帝问题时，是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与习俗观念去分析，还是用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去对待。在评价石敬瑭投靠契丹称帝立国问题上，首先涉及如何看待儿皇帝问题。在评论“儿皇帝”问题时，简单地谴责其“屈辱无耻”与卑鄙，虽不能说责之太过，但似不能圆满地说明问题。类似这种称号，五代时不只石敬瑭一人（契丹主呼刘知远为儿、刘崇称契丹主为叔皇帝、刘承钧称儿皇帝、石重贵称孙皇帝）。我认为这应从契丹当时的社会制度与习俗去分析。到了阿保机时期，契丹才由部落联盟发展为奴隶制汗国，内部是以奴隶占有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汗国的核心迭刺部还保存着氏族制残余，使得其君主习惯以家长身份实行统治，要求臣民象儿子、孙子那样服从自己，“这应当是契丹主屡次要求屈服于他的中原政权的头目称儿皇帝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种影响在封建关系转为成熟的汉族地区还存在。”石敬瑭实际上也是沙陀族一员，而沙陀族本身进化未久，氏族公社遗习相当严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一再指出：氏族存在养子制度。“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的成员。”沙陀等部氏族制残余必然存在，所以养子之风很盛。养子的年龄并非与养父相当。石敬瑭称儿实质上具有耶律德光养子性质。这样分析不是为石敬瑭涂脂抹粉，而是历史主义地看待问题。封建史学强调“夷夏之别”，把少数民族一概视为“夷狄”、“虏”，对于他们进入中原，视为侵掠。认为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与“夷夏之别”论不无关系。多民族的存在，往往会形成多政权并存的政治局，而多政权并存，又易发生内战。契丹贵族掠夺北方地区，是非正义的民族压迫战争，他们统治区的变动，不存在领土“出卖”问题，只能说内部的归属问题。清政府割台等行为才是出卖土地与人民。虽然这一观念受到几位有影响的史学家严厉批评，被扣上几顶帽子，但我坚信历史的事实就是事

实，不是靠恫吓可改变的。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治学不能只有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也不能只有一个领域，要多角度地研究历史。

■郑先生，您现在不再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除了培养博士生外，可以有较充足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您今后有何打算？

●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无止境的。今后除继续专注于晚唐五代史、区域经济史、生产力史的研究外，打算在市场史研究方面多投入一些精力，因为市场史的研究很重要，但目前还比较薄弱，有待于更深层次的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学术成果的剽窃、抄袭之风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有人为此而对簿公堂，您对此有何看法？

●剽窃、抄袭是学术研究中个别人的卑劣行径，应当坚决反对，提倡弘扬学术道德。我以为还有一些原则问题值得讨论。第一，要科学地认识历史。我们之所以要讲科学地认识历史，是因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极为复杂，当我们研究它时，就会发现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即使有了资料，其中有些记载也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在我们对重大历史问题难以作出推断时，往往容易以自己的感性认识去认知某一历史问题。实际上这样做是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的，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曲解、伪造历史。所以，我们要坚持根据事实说话，虽然现代历史是研究古代历史的一把钥匙，但由于历史条件相差太大，还是要尽量避免按现代人的感觉、感知去认识历史，宁可不知，也不可强以为知，不要以为所有历史问题都是能够认识清楚的。

第二，要科学地认识历史学。科学地认识历史学要求我们不能用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代替历史学本身，也就是说，不能把历史学的功能单一化、实用化。中国的历史学从《春秋》到二十四史，都有很强的借鉴功能，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清正廉洁的官员等，都值得很好地借鉴，但历史学的功能不仅仅是借鉴，如果是这样，就会导致缺乏研究某些历史问题的动力和兴趣，甚至因应某种社会需要而裁剪历史。历史是一种变革、革新的过程，是人类活动的过程，是众多事件联系着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只有发现众多事实的联系，举一反三，才能洞悉历史真相。有些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可借鉴，往即往矣，切不可事事今不如昔。

因此，从科学地认识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看，端正的学风应该是根据历史材料研究历史，不能随意曲解、伪造、裁剪历史，否则，极易走向反面。